

文学里的中国元素 阅读拉美现代

孟夏韵



鲁文·达里奥
《生命与希望之歌》

天玄/地黄/雄鸡撕裂夜/水醒来并且问现在几点/风醒来并且问你在那里/一匹白马走过/如同树林在它树叶的床上/你睡于你雨之床里/你歌于你风之床里/你吻于你火花之床里

阿克塔维奥·帕斯
《雷风恒》(《易经》)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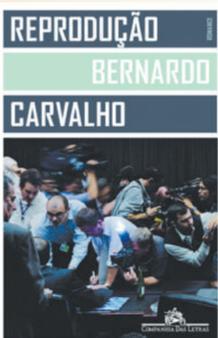
“中国的大地，/我想同你讲话，/只用大地的语言，/只用水稻的绿色语言，/只用深红色的火焰的语言。”

巴勃罗·聂鲁达
《中国大地之歌》

在大部分时间里，我们并不存在；在某些时间，有你而没有我；在另一些时间，有我而没有你；再有一些时间，你我都存在。

豪尔赫·路易斯·博尔赫斯
《小径分岔的花园》

贝尔纳多·卡瓦略
《再现》



梦蝶、精巧工匠和六十四卦，饱满的中国意象雕刻着作家对中国的向往与情愫。

博尔赫斯是中国文化的热爱者、道家哲学的推崇者、中国文学的盛赞者，他吸收《易经》《庄子》《道德经》等中国传统哲学思想，受到《诗经》《红楼梦》《水浒传》等中国古典文学启发，创作出诸多蕴含中国元素的小说。在作家最为著名的短篇小说《小径分岔的花园》里，中国主人公余准和汉学家艾伯特之间关于彭家小说的对话、艾伯特居住的中式花园、凉亭里传来的中国音乐以及书房里的青铜凤凰和红瓷花瓶等，都是中国文化的具象体现。在博尔赫斯笔下，彭家“一心想写一部比《红楼梦》人物更多的小说，建造一个谁都走不出来的迷宫”；时间“深不可测”，“因为时间永远分岔，通向无数的将来”；“无限”意味着“循环不已、周而复始”……这些关于时间与空间的思考，有着“庄周梦蝶”般的虚幻意味与《易经》中的形而上学思想。

全球化进程中的中国形象

近年来，拉美作家对中国的叙述与时俱进，他们对于中国文化的兴趣愈发浓厚，这与拉丁美洲这片热土同中国的关系日益友好，以及中国国际

500多年前，哥伦布曾幻想抵达亚洲东海岸，寻找马可·波罗笔下具有异域情调的东方文明，探寻神秘国度精雕细琢的宫廷建筑、八街九陌的繁华市景和物阜民丰的迷人景象，这是欧洲人通过《马可·波罗游记》对东方的早期想象。发现新大陆后，拉丁美洲大陆与中国逐步建立海上贸易往来，中国的瓷器、丝绸、香料、珠宝、茶叶和艺术漂洋过海，由马尼拉大帆船运抵拉美。早期移居拉美的中国人，则进一步给拉美大陆带来中国文化，为拉美文明融入新鲜元素。

今天，拉丁美洲多元文化和谐共生，在拉美人民日常生活的细碎片段和滋养精神的文艺作品中，常见中国文化身影。遍布街头的中餐厅、中国超市、中医馆和中文学校，潜移默化地影响着当地民众对中国的理解和认知，文艺作品里的中国元素则唤起他们对东方古国的神往与畅想。无论是对远隔重洋的中国文化的想象与构思，还是对移居拉美的华侨华人生活的描摹与解读，都已成为拉美现代文学作品中独辟蹊径的域外书写主题。中国文化是拉美作家丰富的灵感源泉，如同点点星辰挂明月，中国元素在拉丁美洲现当代文学书写中不断涌现，以点带面地向世人展现中国文化的深厚底蕴。

意蕴无穷的中国意象

拉美现代主义文学开创者之一、尼加拉瓜作家鲁文·达里奥(1867年—1916年)崇尚唯美主义，追求异国情调，喜欢描绘欧洲的豪华宫殿和东方的花卉器物，在诗歌、小说和散文中，中国主题是作家构筑想象空间的重要元素。他的诗中常常出现“瓷瓶”“丝绸”“锦缎”“黄金”等典型中国意象，在《神游》一诗中体现得淋漓尽致：

“难道异国的情意缠绵……/像东方的玫瑰使我梦绕魂牵；/丝绸、锦缎、黄金令人心花怒放，/戈蒂那拜倒在中国公主面前。/啊，令人羡慕的美满姻缘；/琉璃宝塔，罕见的‘金莲’，/茶盅、神龟、蟠龙，/恬静、柔和、翠绿的稻田！/用中文表示对我的爱恋，/用李太白的响亮语言。”

诗人以“异国的情意缠绵”开篇，表达了对东方异域情怀的迷恋，对绫罗绸缎的欣赏。诗人以法国唯美主义诗人泰奥菲尔·戈蒂耶自居，通过意蕴无穷的中国意象表达对中国公主的爱慕与追求，那些“琉璃宝塔”“茶盅”“神龟”“蟠龙”，那些富有江南春色的恬静、柔和、翠绿的稻田，令爱慕如薄雾般萦绕于中国风情之中。整首诗充满浪漫的异国情调，以生动描写和丰富比喻表达出诗人对东方的向往与热爱。

此外，达里奥的小说和散文中也屡见优美高雅的中国形象。他细致描摹：“枝形吊灯的光芒欢快地荡漾在金器上，在大理石雕像上，在中国古瓷(绘着)的长袍上……”面对一尊兼具艺术美与自然美的人物半身瓷像，作家表达出对精美绝伦的东方工艺的喜爱：“亚洲艺人有双什么样的手，竟能塑出一个如此奇妙迷人的儿儿！”

不仅达里奥对中国意象的描绘形神兼具，余味悠长，诺贝尔文学奖得主、墨西哥诗人阿克塔维奥·帕斯(1914年—1998年)也深谙中国文化，擅于描绘意境高雅的中国情景。作为最早与中国文化产生联结的拉美诗人之一，帕斯不仅将庄子、李白、杜甫、王维、苏东坡等人的作品翻译成西班牙语，还吸收借鉴中国古典诗歌的意境，在后期诗作中熔东西方文化于一炉，由早期的繁华华丽蜕变为明澈简朴。

在《借鉴》一诗中，帕斯借用“庄周梦蝶”的传说写道：“蝴蝶在汽车间飞舞。/玛丽，何塞对我说：一定是庄子/从纽约经过。但是蝴蝶/不知道自己/是梦想/成为庄子的蝴蝶/还是梦想/成为蝴蝶的庄子。/蝴蝶毫不迟疑，继续向前飞去。”诗人通过对蝴蝶和庄子的联想，引发读者对现实与梦境、生命变化与不确定性，以及存在与消逝的哲学思考。

1968年，当帕斯结束多年外交生涯和国外旅居生活回到家乡墨西哥城后，他对王维因壮志难酬而归隐山林的苦闷情感感同身受，借用王维诗作《酬张少府》中的意象写下长诗《回归》：“渔夫的歌飘荡在静止的岸边，王维酬答张少府，在其湖心的茅庵中，然而我却不曾在圣安赫尔或科约阿坎有个智者隐士的居所。”而王维《酬张少府》的原诗为：“晚年唯好静，万事不关心。自顾无长策，空知返旧林。松风吹解带，山月照弹琴。君问穷通理，渔歌入浦深。”借由王维的人生经历，帕斯表达出自己与中国诗人在相似境遇下的心境与哲思。

真挚动人的中国情愫

与达里奥和帕斯诗作中蕴藏着丰

创作者谈

让历史小说与当代读者产生共鸣

马伯庸

今年，根据我的同名历史小说改编的网络剧《显微镜下的大明》(见右图)在国内播出，观众反响良好。原著中的六个故事来自方志、杂抄等民间案牍，从明代基层官吏和专业人士的视角出发，于细微处向读者展示明代中国。小说也获得泰国读者的喜爱，泰国“中国文学读者俱乐部”曾在曼谷举办《显微镜下的大明》读者交流活动。与泰国读者交流时，我抛出一个问题：“我的作品写的都是中国古代的人和事，大家为什么喜欢读？”读者们的回答五花八门：有的被密集反转和紧张节奏吸引，有的被主人公的人格魅力打动，尤其令我印象深刻的是一位读者说自己遇到和小说主角同样的困惑，想看看故事里的解决之道。

历史小说为什么会吸引当代读者？除了“以史为镜，可以知兴替”“鉴于往事，有资于治道”这些道理外，那位泰国读者很好地回答了这个问题：在历史小说中，我们看到了古今相通的人性共性，看到了历史与当下的连接，这些是将个人经历置于不同时代场景中的再体验。

意大利历史学家克罗齐曾提出过一个命题：“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。”他认为，历史需以当下现实为锚点，才能够进行讨论与重构。“当代史”不是以某个时间为界限，而是取决于历史事实能否与个体生命经验产生关联。在文学领域，我们可以将这句话略作引申：“一切历史小说，都是当代题材小说。”文学作品讲的虽是历史掌故，倾注的却是作者对当下的观照，与作者同时代的读者看到后，自然会生发共鸣之心。回顾文学史，历经时间淘洗流传下来的优秀作品，无一不具有跨越时代、感动读者的力量。

我们为《离骚》而流泪，是因为我们同样具有屈原那样的爱国情怀；我们爱读《西厢记》，是源自对爱情的浪漫憧憬；我们乐意大利作家乔万尼奥里的《斯巴达克斯》，是因为从中感受到对自由的向往。这些情感并非来自作者赋予，而是我们自身的理解与渴求恰好在作品中寻得共鸣。

在我看来，历史小说作者的任务不是如史学家般抉微钩沉、探寻真相。历史小说作者要寻找古代人与现代人在精神层面的共性，提炼不因时光流转而改变的某些特质，并映照到现实中来。从这个意义上讲，历史小说的立意至关重要。历史小说虽以陈旧的历史为素材，意识却应是现代的、崭新的。诚如法国作家大仲马所言，历史提供了一枚钉子，用来悬挂小说的大衣。钉子可以是老的，大衣却一定要是新款。优秀的历史小说绝非简单复刻古代，而要融入现代意识。姚雪垠的《李自成》、鲁迅的《故事新编》和日本作家井上靖的《敦煌》等，都是其中翘楚。

在历史的缝隙中，亦有许多可能性值得挖掘，值得用想象去填补——我将其称为“历史可能性”写作。我用类似于“夹心饼干式”的写作方法处理故事和历史之间的虚实关系：对历史大事件和确实存在的历史人物，不去改变，力求真实；对风土人情、典章器物等生活细节，也不做改变，并力求考据精细。于两层真实之间，我会加入虚构内容，力求“大事不虚，小事不拘”，令故事尽量精彩可信。

近年来，我追随前辈，坚持从大众角度展开写作。小说《长安十二时辰》的立意最终落在“守护长安”这样一个命题上：张小敬，一个在正史中仅有短短一句话记载的“小人物”，如何守护他所爱的城市，保护生活其间的万千百姓。他的言行超越了贵贱有别的封建社会陈规习俗，自觉闪耀着人民史观。读者阅读时，会下意识地联想到身边的警察、医护和消防队员，想到这些默默守护我们日常生活的普通人。这种个人的体验与感动，会移情到主角张小敬身上，与小说作者共同完成角色塑造。

《大医》是我新近创作的长篇历史小说，分为“破晓篇”和“日出篇”两部出版。故事同样聚焦“大历史中的小人物”，以20世纪初的中国为背景，讲述三个普通年轻人互相扶持、逐渐成长为公共慈善医生，并体悟到何为“苍生大医”的故事。那些在国家危难之际毅然放弃舒适生活、选择救死扶伤的前辈医生们，也从我的笔端走出，共同绘就中国红十字运动的历史画卷。《大医》出版



后不久，即入围中国作协“新时代文学攀登计划”首批项目，受到读者朋友的广泛欢迎，有望进行影视拍摄。我期待这部讲述中国医者仁心的故事，未来也能够通过文字和影像拨动海外读者与观众的心弦。

当下，以网络文学、影视IP等为代表的数字化传播方式，已成为中国文化出海的重要航线。由我创作的小说改编的影视剧《长安十二时辰》《风起洛阳》也搭上“国剧出海”这艘大船，跨越不同语言和文化，令外国观众了解中国、爱上中国，令我收获了一批外国读者。

通过与不同国家的读者交流，我愈发深刻体会到，人类彼此之间的共性大于个性。无论身处哪个国家、哪个文化圈，人们珍视的东西基本一致：对家庭的关心、对亲情的眷恋，对友情的渴望，对自己成长的表达……一位泰国读者读到《三国机密》里杨修渴望得到父亲杨彪的认可，便想到自己叛逆的青春期；一位日本读者看完《长安十二时辰》后，特意写了书评，感慨盛世长安的浪漫繁华。同样，我作为中国读者，也能被奥地利作家茨威格的《人类的群星闪耀时》所展现的“大历史观”深深震撼，也能从法国作家巴尔扎克的《人间喜剧》里看到世情百态。由此可见，迥异的文化背景并不会成为阅读的障碍。

我曾在新西兰留学4年，给许多当地朋友讲过中国传奇故事中的四大悲剧。他们并不知道西王母和秦始皇，也不明白西湖和化蝶的文化内涵，但这不妨碍他们为白素贞、孟姜女、牛郎织女和梁山伯与祝英台的遭遇而流泪。原因无他，这4个故事体现出的人性魅力超越了文化背景差异，无需特别翻译，放之四海皆能获得理解、引发共鸣。

在为《大医》做史料研究时，我读到唐代医药学家孙思邈《备急千金要方》中的一句话：“若有疾厄来求救者，不得问其贵贱贫富，长幼妍媸，怨亲善友，华夷愚智，普同一等，皆如至亲之想。亦不得瞻前顾后，自虑吉凶，护惜身命。见彼苦恼，若己有之，深心凄怆，勿避险巇、昼夜寒暑，饥渴疲乏，一心赴救，无作功夫形迹之心。”这与当代医学生入学前宣读的《希波克拉底誓言》有着异曲同工之妙。二者表达方式虽然不同，核心思想却基本一致。这说明医德同样超越不同文明，具有人性至善至美的共通点。从这样的“人性共通点”入手创作，也就无需担心语言的藩篱、文化的隔膜。

中国文化源远流长，独具魅力。当我们向海外的受众讲述中国故事时，在把握历史事实、体现文化内涵之外，还应注意如何讲述一个好故事。这要求作者勇于守正创新，在坚持本国文化特色的前提下，寻找到能够打动更多人的情感共鸣点，寻找到与当下时代的连接点。

(作者为中国当代作家)



本版责编：王佳可 徐馨 庄雅雅 王迪
电子信箱：rnmrbgfk@163.com
版式设计：蔡华伟